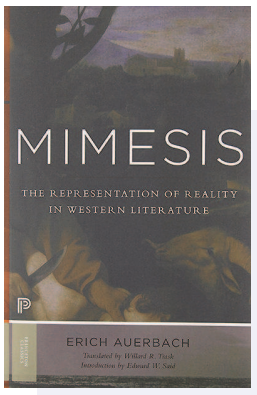
（上接2版）

人难以忘怀的、美丽的文字：……。奥尔巴赫，那位作为流亡者在土耳其度过了二战岁月的德国学者援引了这个段落，将它作为每一个希望超越帝国、民族和地区范围之局限的男人和女人的榜样。例如，一位历史学家只有通过这种态度才能够开始在所有他们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领会人类的经验和它的文字记录；否则，人将会依然更多地致力于对偏见的排除和反动，而不是对真实知识的消极自由。但请注意奥尔巴赫两次表明“强大的”或者“完美的”人取得独立和超越靠的是消解执着，而不是拒绝它们。流亡是以一个人的故乡的存在、对它的爱和与它的一个实际的联结为基础的；流亡的普遍的真实并不是人已经失去了爱和家园，而是在每一个中固有的是一种没有预期到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损失。于是，从各种经验来看，它们似乎将要消失了：将它们固定和根植于现实之中它们又会是什么呢？你要拯救它们的是什么？你要放弃什么？你要恢复什么？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就必须独立于和超越那些人，即[那些认为]他们的故乡是“甜美的”，但他的实际状况又使得要找回这种甜美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更少可能从依靠幻觉和教条所提供的替代物中获得满足，不管[这种满足]是得自对自己的遗产[传统]的自豪还是对“我们”是谁的确信。



犹太裔德国学者奥尔巴赫和他的《摹仿论》（50周年纪念版，2013）

没有人今天纯粹是一个东西。像印度人，或者女人，或者穆斯林，或者美国人这样的标签，不过只是各种出发点而已，假如紧接着进入实际的经验，那么一会儿它就很快会被彻底丢弃。在一个全球的范围内，帝国主义巩固了各种文化和认同的混合。但是，它的最坏的、最荒谬的礼物是让人相信他们只是、主要是、完全是白人或者黑人，西方人或者东方人。然而，就如人类制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一样，他们也制造他们的文化和族群认同。没有人可以否认悠久的传统、持续的居住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地理的延续不断的连贯性，但是，除了恐惧和偏见，似乎没有其他理由让人坚持执守他们［与他人］的分离性和独一无二性，好像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事实上，生存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结；用艾略特的话来说，现实不能剥夺“住在花园里的其他回响［花或者相应物］”。与只想“我们”相比，具体地、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地去想想别人，则更有益处，也更困难。但这也意味着不要试图去统治他人，不要去将他们分类或者在他们中间划分等级，最主要的是，不要反反复复地重申“我们的”文化或者国家何以是第一（或者就此而言，不是第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没有那些也已有足够的价值可做了。[6]

于此，萨义德有鉴于他当时所处世界之现实，且以他一贯的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给圣维克多的雨果的“异乡说”以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与八百年前雨果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于今日这个世界，诸如故乡、民族/国家、世界等，从概念到实际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萨义德所说，“没有人今天纯粹是**一个**东西”（No one today is purely ***one*** thing），人们对自己的种族、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划分和构建，都是一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情；然而，对于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却是各个民族、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互相联结，所以，只有超越帝国、民族和地区的划分施加给人们的局限，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我们这个世界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变得更好。圣维克多的雨果所说的“把整个世界当作异乡的人是完美的”，到萨义德笔下则成了一种用来批判和取代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理想。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不再需要经历实际的流亡就能感受到失去故乡的无奈和痛苦——不但故乡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瞬息之间或就已经面目全非，让人感到陌生和淡漠；而且也很少有人一生能固定地住在一个可被称为故乡的地方，更多的人为了生计或者生涯持续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而每一次的移动或都是一次爱和家园的失落。本来令人们魂牵梦系的故乡，却早已是不折不扣的异乡。同样发表于1952年的L. P. Hartley的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劈头来上这么一句，“过去是一个异乡，那里他们不一样地做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没想到它却成了不朽的至理名言。它用文学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哲学的道理：人的记忆或者历史都是很不可靠的，往好里说它亦真亦假或半真半假，往坏里说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建构。人们记忆中的故乡，与Hartley所说的过去一样，都不过是寄托心中美好的愿望的地方，它们都是异乡，它们的甜美多半是人们向往、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所以，有着成熟心智的人们，只有超越对故乡和过去的执着，才能客观地认识故乡和过去。

近日读到童庆生先生对前述奥尔巴赫对雨果“异乡说”的诠释的一段评论，他说：

奥尔巴赫饱蘸着情感写下了对这段文字的感受：“雨果的文字是写给那些想要摆脱对世界的爱的人的，但是对于那些希望推动为世界而爱的人，也同样适用。”“对世界之爱”和“为世界之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和人生观，在英文译文中以两个介词“of”和“for”做区分。“对世界之爱”（love of the world）中的“世界”是爱的对象，也是期望拥有或占有的对象，这种爱虽然已经十分宽广，但仍然受制于外部世界。“为世界而爱”（love for the world）中的世界并非爱的对象，也不是期待占有或者拥有的对象，而是爱的理由；因为世界而爱，没有具体物质对象的爱，无功利的爱，这是无私的博爱。只有当思想融合了深沉的道德诉求和理想，只有当我们有了超越自我——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意愿和胸怀，文学研究才有可能超越技术性的学术研究，才会具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感染力。[7]

确实，童先生的这段文字也饱蘸情感，读来令人怦然心动。他对“对世界之爱”和“为世界之爱”这两种不同的爱的区分和阐发，发自肺腑，闪烁着智慧和思想的光芒，这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对雨果“异乡说”的一种新的、精湛的洞察。

然而，童先生的这段议论只是他自己的创造和发挥，它根本无法在奥尔巴赫原文中找到任何依据。他所说的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其意趣与雨果“异乡说”的本意南辕北辙。不得不说，他的这段极具感染力的议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他对奥尔巴赫原文的误读的基础之上的。在奥尔巴赫德文原作中，它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Hugo meinte das fuer den, dessen Ziel Losloesung von der Liebe zur Welt ist. Doch auch fuer einen, der die rechte Liebe zur Welt gewinnen will, ist es ein guter Weg.”它或可汉译作：“雨果是针对那些其目的是要与对世界的爱相脱离的人而说的；不过，对一位想赢得对世界的正确的爱的人来说，它也是一条好的道路。”而这句话在萨义德的英文译文中是这样的：“Hugo intended these lines for one whose aim is to free himself from a love of the world. But it is a good way also for one who wishes to earn a proper love for the world.”应该说，萨义德的英译文与德文原文基本一致，只是德文中出现的两处“对世界之爱”，其原文都是“Liebe zur Welt”，二者没有差别。然在英译文中，它们却分别被译成了“a love of the world”和“a proper love for the world”，即前后分别用了“of”和“for”两个不同的介词。这个差别看起来只是修辞上的变化，并不是译者有意要借此而对它们作意义上的改变。

其实，《知识论》中说得很明白：“那个稚嫩的灵魂把他的爱固定在了世界的某个地方；那位强大的人将他的爱延伸到了所有地方；而那个完美的人则熄灭了他的[爱]。”奥尔巴赫的理想一定是做一位已经熄灭了对世界的爱，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完人，他希望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语文学家们都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世界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超越，并进而能够真切和客观地去认识它们。所以，他不可能把雨果的“异乡说”解释为“对世界的”或者“为世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爱，他只是表示对“世界之爱”的脱离和超越或可算作是另一种爱的方式，是“对世界的正确的爱”。

童先生从英译文中前后两个介词的变化中推演出了两种不同的“世界之爱”，这无疑只是他自己的想象和发挥，与奥尔巴赫和萨义德无关。童先生将文中最后一句话，即“对一位想赢得对世界的正确的爱的人来说，它也是一条好的道路”，改译成“但是对于那些希望推动为世界而爱的人，也同样适用”，这应该是他为了更好地迎合他的“为世界之爱”的解释而做出的不够精细的翻译选择，原文和英译文中显然都没有一个可与“推动”意义相应的词汇。不得不说，童先生对奥尔巴赫这个句子作出如此高调和独到的诠释，凭借的却仅仅是萨义德英译文中两个介词的变化，完全没有想到或该去查阅一下奥尔巴赫的德文原文，这无疑有点鲁莽了。遗憾的是，语文学不到位处，过度诠释往往就接踵而至了，此处也不算例外。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1]*The Didascalicon of Hugh of ST. Victor: A Medieval Guide to the Arts*,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erome Taylor,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01.
[2]Erich Auerbach, “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 *Weltliteratur: Festgabe für Fritz Strich zum 70. Geburtag*, edited by Walter Muschg and Emil Staiger (in association with Walter Henzen), Berne: Franke Verlag, 1952, p. 49—50.
[3]Edward W. Said, “Return to Philology,”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7—84.
[4]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translated by Maire Said and Edward Said, *The Centennial Review*, Vol. 13, No. 1 (WINTER 1969), pp. 1—17.
[5]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259.
[6]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p. 335—336.
[7]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6页。